

罗平汉 著

墙上春秋

大字报的兴衰

中共党史出版社

墙上春秋

大字报的兴衰

罗平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墙上春秋:大字报的兴衰/罗平汉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098-3096-3

I. ①墙… II. ①罗… III. ①政治运动—史料—中国—现代
IV. ①D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3129 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亚平

复 审:黄 艳

终 审:汪晓军

责任校对:龚秀华

责任印制:谷智宇

责任监制:贺冬英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 dscbs.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16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17.2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3096-3

定 价:29.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197

引 言

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东西，如果要以定义的方式对其加以界定，却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大字报便是其中的一例。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这20余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共贴出了多少张大字报，恐怕是永远也无法统计出来了。遥想当年，稍微能识文断字的人，没写过大字报者，或许不会很多；没看过大字报者，更是寥若晨星。大字报成了这些年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何谓大字报？《现代汉语词典》上没有条文，洋洋千万字的《汉语大词典》上没有解释，修订后的《辞海》《辞源》上也查不到。是这些著名辞典的编纂者们的无意疏忽，还是实在无法作出解释而弃之不录，不得而知。

余生也晚，稍认几个方块字的时候，大字报已是强弩之末，不过还是有幸赶上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懵懵懂懂地从老师那里知道北京有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在日记中对“师道尊严”进行“声讨”。老师号召我们向这位同学学习，批判“师道尊严”，还要求我们四年级的学生人人都写一张大字报。

我的家乡其实是一个十分闭塞的乡村，我们学校虽然有四个年级，却只有一个老师，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学校教育叫做复式教学。

老师虽然对我们提出了写大字报批“师道尊严”的要求，但我们在连报纸

都难看到的地方，虽说斗争“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的事也看到过，但“师道尊严”是什么意思却实在弄不懂，而且认识的几个有限的方块字连组合成句子写出来都颇感为难，更不要说给老师写大字报了。何况老师对我们一点也不严，在低年级的同学上课时，我们溜出教室玩耍，老师也只是把我们喊回来了事，实在想不出老师哪些地方可以批判。村子就那么大，同学和老师差不多都沾亲带故。好在老师提出要求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催问我们，大概他心里明白，自己的学生确实还没有写大字报的水平，无法与北京那位小学生相比，事情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过了一两年，“四人帮”垮了台，“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又过了几年，听说取消宪法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几年，虽然有些地方有人偶尔还在贴大字报，但在我们那块经济、文化都落后，又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大字报却没有见到。

等到我研究当代中国史时，才从旧日的报刊上对当年那些名噪一时的大字报有了一些了解，于是萌生出对这20余年大字报的历史作个简单勾勒的想法。

可是，究竟什么叫大字报却使我犯了难。既然从词典中没有现成的解释可以照搬，按理，有必要自己对此作一番概括。无奈有此心却无此才，而且转念一想，有些东西越解释越说不清楚，当年人们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在一张大白纸（也可以是红纸、黄纸）上，贴出去，就成了大字报，对什么样才称得上大字报并没有具体的标准，今天又何必非要对其作个定义呢？

不用说，大字报滥觞于1957年那场被严重扩大化了的反右派运动。

1957年5月19日，富有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贴出了这场运动中的第一张大字报。有了第一张，便有第二张、第三张，于是乎，北大校园里一张又一张的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

北大不仅是中国最知名的学府，也是中国政治的晴雨表。北大出现大字报之后，北京的其他高校也相继出现了大字报。紧接着，全国各地高校中大字报也就接二连三地贴了出来，很快出现了大字报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反右派运动的暴风雨来临之前，由于允许“大鸣大放”，“香花”和“毒草”也就不免随着鸣放而共生，这原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由于中共主要领导人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又采用了“引蛇出洞”的“阳谋”，

不少人怀着忠诚的进谏之心，利用大字报提意见、谈看法，结果，等到“这是为什么？”的一声怒吼发出，相当多的大字报作者接二连三地成了“右派分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工具”的大字报，在反右派运动中却成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武器，并且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一再肯定，甚至被赞扬为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此后，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广泛使用。当时的宣传舆论工具也对大字报的功效一再推崇，大字报的作用被吹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那个创造神话的年代制造出一件又一件滑稽的事情来。

“大跃进”运动之后，大字报曾一度沉寂了好几年时间。然而，“文化大革命”之后，自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大字报的狂飙再次席卷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大动乱的年代里，大字报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悲剧，一桩又一桩冤案。个别人因为写了一张“革命”大字报而飞黄腾达、青云直上，而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许多人则被大字报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被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诚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出现过反对林彪、江青集团倒行逆施的大字报，但这种反抗往往是无力的，而且这些大字报的作者几乎都受到了林彪、江青集团的残酷迫害，从而也证明了这种所谓的“大民主”实际上是对民主的大反动。

大字报在中国折腾20余年之后，人们对其危害的认识也就逐渐深刻。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定，取消了宪法中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大字报从此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成为历史的陈迹。

大字报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曾经盛行一时，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字报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命运。虽然大字报已成了过眼烟云，但是，对其由盛而衰的过程作简单的回顾，应该说是有助于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曲折发展道路进行认真反思的。反思历史，是为了减少未来道路的曲折，这正是本书的希望所在。

引 言 1

一、“钓大鱼”钓出了大字报 1

- 1.短暂的春天 / 1
- 2.“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 10
- 3.大字报“大吐毒素” / 20
- 4.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 / 27

二、大字报高潮再起 35

- 1.“大字报是个好东西” / 35
- 2.工厂整风大字报“越多越好” / 38
- 3.机关、高校贴满了大字报 / 50

三、大字报与“大跃进” 57

- 1.大字报上展开红专辩论 / 57
- 2.用大字报“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 68
- 3.“写一份大字报就是对社会主义的一份贡献” / 76
- 4.大字报推动农村“大跃进” / 85
- 5.“大字报社”与“大字报选集” / 94

四、“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101

- 1.“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 / 101
- 2.“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 109
- 3.第一批被大字报击中的“黑帮” / 115

五、大字报高呼“造反有理” 125

- 1.大字报的矛头对准了工作组 / 125
- 2.三张鼓吹“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 / 130
- 3.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 / 138
- 4.“封、资、修”人物在大字报面前纷纷落马 / 141

六、大字报与刘少奇冤案 147

- 1.“炮打司令部”——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 / 147
- 2.大字报问罪国家主席 / 151
- 3.大字报在“革命大批判”中唱主角 / 160

七、指向老一辈革命家的大字报 167

- 1.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成了大字报“炮轰”的对象 / 167
- 2.大字报轰倒“中国第四号人物” / 172
- 3.一张大字报引出“二月兵变”冤案 / 180
- 4.“大字报整人，不可信” / 182

八、大字报画卷中的特殊一页 189

- 1.要揪出“林副统帅”的大字报 / 189
- 2.“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的老虎屁股摸不得” / 196
- 3.外交官们写大字报保陈毅 / 200
- 4.一张感人至深的大字报 / 206

九、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209

- 1.大字报参与“反潮流” / 209
- 2.大字报使军报变相停刊 / 218
- 3.全面整顿中的大字报 / 223
- 4.“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大字报 / 229
- 5.大字报与“四五运动” / 237

十、大字报历史的终结 243

- 1.被大字报撵走的中央组织部部长 / 243
- 2.红旗杂志社大院出现了大字报 / 247
- 3.大字报的历史终于画上了句号 / 254

结 语 259

主要参考书目 263

一、“钓大鱼”钓出了大字报

1. 短暂的春天

要追溯大字报的历史，不能不回顾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

这本是一个春光明媚、百花齐放、令人舒坦的春天。可惜，春光虽然好，酷暑却早来。

这年开春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大张旗鼓地号召党外人士帮助自己改进作风，以整顿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也就是帮助党整顿“三风”。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有过好几次整风。

第一次在延安时期。这次整风时间很长，从1942年春至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在整风运动中，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被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受到了沉重打击，树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二次整风在1948年前后。这次是各解放区党组织结合当时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进行的。这次整风，声势虽没有延安整风大，但对纯洁党的组织，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次整风则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这次整风，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的初步经验，保证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顺利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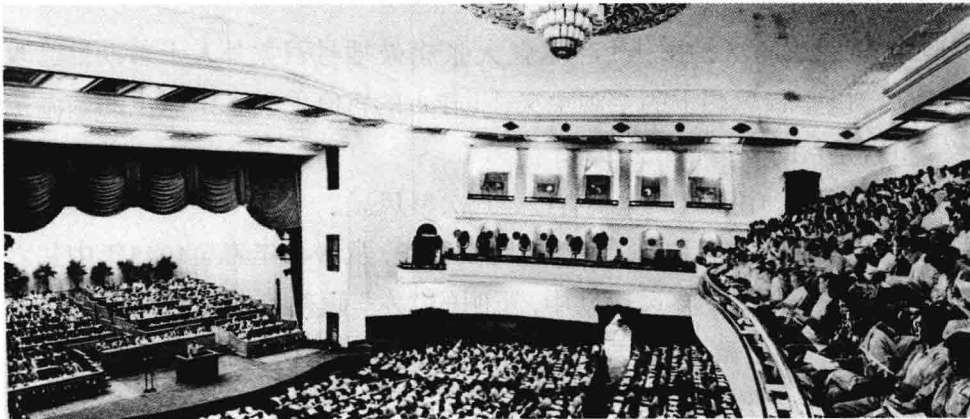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之所以要在1957年春天开始发动一场新的整风运动，也是事出有因。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有这么一段话：

许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①

既然要用“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去克服这些“严重的缺点”，自然要采用整风的办法。

于是，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明确



◇ 中共八大会场。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

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①

为什么要采取整风的办法去整顿三风？毛泽东在讲话中解释说：

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②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整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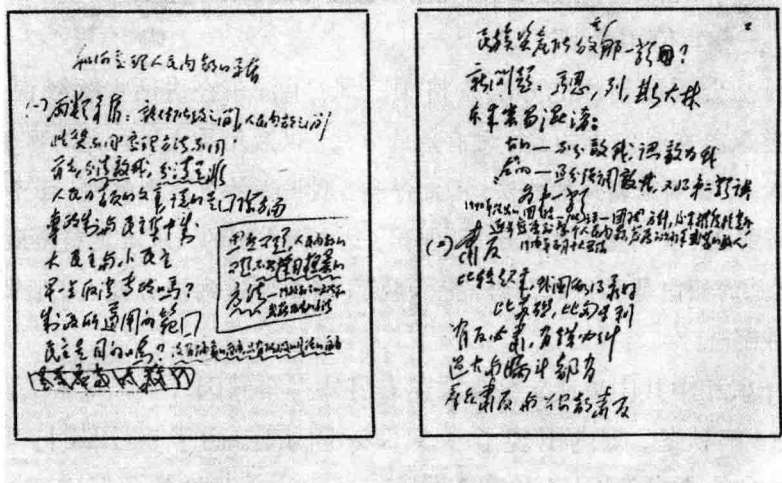
1956年秋冬，国内出现了一些不安定因素。由于受国际上“波匈事件”^③的影响，加上国内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和社会改造的急进行，使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出现了某些紧张因素。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上遇到不少困难，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约有1万多工人罢工，1万多学生罢课请愿。在农村，夏收以来不少地区连续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由于中共鼓励“百家争鸣”，对时局十分敏感的知识分子一时显得特别活跃，他们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有些人甚至对党和政府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和干部作风问题提出公开批评。面对这种新的形势，许多干部要么束手无策，要么以阶级斗争的老眼光对待新问题，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办法。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正确区分和对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巩固社会主义新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③ 1956年6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同年10月至11月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地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



◇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纲的手迹。

尽管当时出现了学生闹事、工人罢工，还有一些教授的“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形势看得很严重。他认为闹事的原因，除了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存在的因素外，主要还是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或经济上犯了错误，或者是工作方法不对。至于民主人士，毛泽东说，“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不这样，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只有国民党才害怕批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决定按照既定的方针把整风运动发动起来，以克服党内存在的“三风”。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3月12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他甚至表示，领导我们国家的应该是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提意见，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四天后，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指示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①

《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的正式启动。



◇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该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223页。

为了深入开展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发动、鼓励党外人士帮助中共整风。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其中说：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①

中共中央还明确指示：“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

为了贯彻这个指示，各地各系统都相继举行座谈会。上海最先行动，这份指示发出的第四天，《解放日报》就邀请22位中小学教师举行座谈，请他们谈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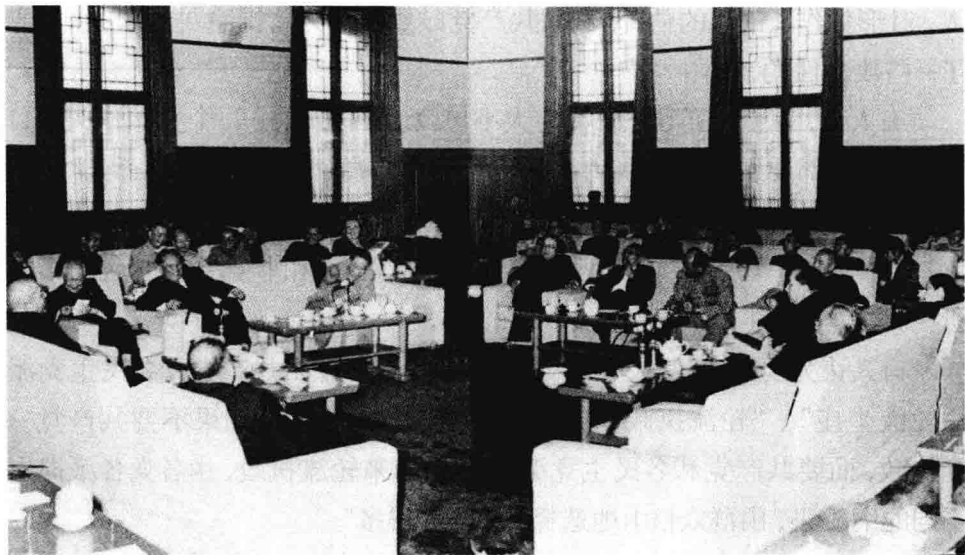
旧时代，人们总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来形容中国的读书人即知识分子。其实，这并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性格，“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才是知识分子的本性。现在党鼓励党外人士（这些党外人士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向自己提意见，党外人士们也就不客气，他们畅所欲言，对党的工作中的种种问题作了大量的批评。《解放日报》在5月10日的第2版上，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毛泽东看到这些发言的内容后，对座谈会上揭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很重视，他在这份报纸的边上批示道：“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看一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写完这段话，毛泽东意犹未尽，又在旁边加写道：“请你们注意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这个批示说明，毛泽东对这些批评意见是何等重视！

为了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第四次党外人士座谈会会场。

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随后又召开了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对这些座谈会的发言,《人民日报》都及时作了报道。

这两次座谈会从5月1日一直开到5月中旬。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了13次,70多人发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了25次,108人次发言。在此期间,国务院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学校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这些座谈会的发言,也分别登载在各地的报纸上和高校的校报上。有“知识分子喉舌”之称的《光明日报》,先后在上海、天津等全国九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鸣放”,并作了详尽的报道。

在“鸣放”过程中,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后来回忆,党外人士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①。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29页。

人，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利用共产党鼓励党外人士提意见的机会，发表了一些攻击性的言论。

有人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眼色行事”。“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

有人认为要改变这种一党天下的局面，就必须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轮流坐庄”、“轮流执政”，说“一党执政有害处”，“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纲领来，由群众自由地选择，这样好得多”。

也有人甚至有趁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之意。他们说“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

还有人怀疑共产党这次整风运动的动机，用煽动的语气说，“过去几次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

更有人把矛头对向了毛泽东，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如此等等。

在要不要共产党领导和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警惕性一直很高。为了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整个形势的变化与发展。

那时，李维汉时常向毛泽东汇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的情况，各地整风的动态和党外人士的各种言论也源源不断地送到毛泽东的案头。当毛泽东看到上面这些言论的时候，很快就敏锐地觉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

5月中旬，“党天下”、“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言论“放”了出